

## 孜孜以求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者

——怀念恩师雍文远先生

韩汉君

经济学理论前辈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进程中，作出了诸多卓越的贡献。雍文远先生作为这支队伍中的杰出一员，在艰难的探索中留下了自己的脚印，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恩师雍文远先生离开我们近百日。回想与雍老在一起的日子，他慈祥红润的面容，带有浓重四川口音的谆谆教导，与老同事们郊游回来时的矫健身影，手拿照相机招呼我们一起合影时的喜悦，健步下楼与我们挥手告别……历历在目。

雍文远先生长期从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作出许多重要贡献。1961年，他和姚耐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是我国经济学界的第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1985年12月，雍文远主编的《社会必要产品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该著作1987年获得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

## 结合实际探索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1916年10月，雍文远先生出生于四川省渠县，少怀忧国忧民、图强励精之志，因而勤奋好学，刻苦攻读。1937年11月，雍文远考入重庆中央大学经济系。从此，他开始了钻研经济学理论的学术生涯。

1939年，在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白色恐怖笼罩下，雍文远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领导重庆市沙磁区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

1943年8月，雍文远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的南开经济研究所。他在硕士论文《庇古和凯恩斯就业理论的比较研究》的前言中写道：“资本主义比之封建主义来说，造成了庞大的生产力；但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富裕中的贫困，造成了广大的饥饿人群。”

1947年秋，雍文远抱着亲身观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情况的愿望，远渡重洋，前往美国，在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就学。当时的课程大都是他在南开经济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时已经修读过的，因而有时间和条件大量阅读课程以外的书刊。其间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基础理论。一年中，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英文版的《资本论》、《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原著。他在威斯康星大学写下的硕士论文《马克思的失业理论》，就是他刻苦学习和钻研马列主义原著后的成果。

1949年1月，雍文远回到了上海。3月，已在国立上海商学院任教授的他同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积极参



雍文远（1916—2021）

文汇报学人  
第457期

加了迎接解放的工作。1949年8月，上海商学院成立校务委员会，雍文远任校务委员会委员，并兼秘书处主任。1950年，上海商学院改为上海财经经济学院，取消了校务委员会，改行院长制。孙冶方任院长，姚耐为副院长，雍文远任总务处主任。这期间，他还曾先后兼任该校的财政金融系主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等职。

在从事繁重的教学管理工作和科研工作的同时，雍文远还承担了大量的社会工作。他先后担任过上海市新经济学会理事、上海市财政金融学会常务理事。同时，雍文远继续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并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规律性问题。在上世纪50年代前期和中期，他发表了一系列经济学论文。1958年8月，院校调

整后，雍文远一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工作。

1958年，政治经济学界开展了以重新认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时期的作用为主题的调研与讨论。1959年1月，雍文远与同事们一起深入工业、农业、商业部门，展开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调研，写出了相关的调查报告。1959年4月，雍文远在上海参加全国第一次经济理论研讨会，集中讨论价值规律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雍老曾在回忆这些活动时谈他的体会：政治经济学研究离不开实践，特别是中国的发展实践，理论要从深入现实中得到印证和发展，研究要脚踏实地，从表面一般的事物中寻找经济规律性，进而指导发展实践。

## 持续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

新中国成立后，大学课堂里改用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材。雍文远感到教材中资本主义部分的矛盾分析引人入胜，而社会主义部分平铺直叙，没有矛盾分析，索然寡味。

1958年，正当学术界苦于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的时候，也正值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一周年，雍文远写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启示》一文，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任务和研究方法，都应依据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来一番彻底改造。这是他试图用矛盾分析方法来改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早想法。

1958年，中宣部召开各省市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材编写会议，要求突破苏联教科书的传统理论框架，总结和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编写适合我国特点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教材。1959年11月，上海组织了政治经济学教材编写组。1961年9月，由姚耐、雍文远、蒋学模、苏绍智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出版，成为华东地区高校文科政治经济学教材。这是一本力图结合我国实际来探索和总结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是政治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大突破，凝聚了包括雍老在内的这一代理论工作者从实践中去探索和把握经济建设规律的艰辛努力。

1980年开始，雍文远就设想，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编写一本对旧的理论体系有所突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1983年3月，在国务院全国经济学科规划小组召开的规划会议上，雍文远提交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计划，被列为全国“六五”期间重点科研项目，也是在经济理论领域“拨乱反正”中的重大项目。

在该课题列入国家规划以后，雍文远把他所在工作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研究室的主要力量都投入进去，包括李鸿江、袁恩桢等资深专家，以及一批中青年科研人员。雍文远以及整个课题组成员都满怀激情，深感是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学理论的春天。

与50年代末雍文远参与编写的那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不同的是，随着实践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

《社会必要产品论》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化，形成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点范畴、主体经济范畴（资金）、基本经济范畴（社会必要产品，即V+M，劳动者所得和剩余产品价值）的理论核心，进一步以再生产过程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架构体系。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这一观点和理论体系是有生命力的。

紧接着，雍文远作为课题组负责人又承接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第七个五年规划的重点课题，在社会必要产品论的基础上开展了运行机制的研究。1990年，该课题研究成果《双重运行机制——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再探索》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社会必要产品论》的继续和深化，进一步回答了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各经济主体的相互联系与运行方式，指出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无论是经济主体的动力机制还是调节机制都是双重的，即自觉的计划机制与自发的市场机制这双重经济机制共同作用。

回过头来看，从1958年毛泽东同志提出要尊重价值规律，1959年中宣部推动编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上海编写《政治经济学教材（社会主义部分）》，到1985年《社会必要产品论》和1990年《双重运行机制》的出版，雍文远这一代理论工作者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

## 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毫无疑问是一门理论学科，但同时也是一门实践的学科。在雍文远等老一代学者的带领和培育下，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逐渐形成了紧跟现实问题、注重实地调研的研究传统。

早在50年代末，以雍文远为组长的13人调查组就去了河南省汝南县光明人民公社，开展实际调查。雍文远等蹲点三个月，亲眼看到了推行极“左”路线的严重后果。三个月的调查实践使雍文远和调查组的其他同志了解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实际情况。

从河南回上海后不久，雍文远又不辞劳苦，再次带队赴浙江农村调查经济问题。浙江作为沿海省份，历史上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价值规律对农业生产的调节作用仍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顽强表现出来。其中浙江富阳县的里山和灵桥两个公社属于半山区，商品率达到50%；桐庐县的新登公社是山区，商

品经济更发达，商品率达到90%。此次调查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第一手材料，调查组写下了两份调查报告，阐明了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强调了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社会生产的重要调节作用。

1959年4月，在孙冶方的建议下，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问题的全国第一次经济理论研讨会在上海召开。雍文远于会上提交了在浙江省完成的两个农村经济调查报告，并且作了关于“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问题的一些看法”的发言，针对当时把价值规律对生产的调节作用只局限于私有制条件下自发地发生的论点，阐明了他的不同看法。

此次会议形成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仍然存在，并发挥着调节作用”的理论共识。《人民日报》对这次全国经济理论研讨会作了报道：会议所讨论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以及计件工资等问题，都是当时我国现实经济中的重要问题，而且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重要问题。这次会议对于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学说，从理论上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高我们的理论水平，也有积极的作用。

1961年，在孙冶方带领下，雍文远参加了对上海国棉一厂的调查。在调查中，雍文远等看到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很多弊端。基于这些调查，雍文远撰写了《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可贵探索》一文。

广泛的调查研究 and 理论探讨，对于雍文远形成自己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基本看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他后来回顾说：“要说学术思想的发展，这段时期对我的教育最大。它使我看清了搞社会主义不能只有一股热情，还要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尊重科学。”

2015年1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任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会上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有生命力，就必须与时俱进。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经济学理论前辈们在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进程中，作出了诸多卓越的贡献。雍文远先生作为这支队伍中的杰出一员，在艰难的探索中留下了自己的脚印，永远值得我们怀念。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王鸣盛与钱大昕既是同乡同学，又是朝夕相处的亲戚。钱大昕是王家赘婿，王鸣盛乃其妻兄，他们可谓学术上的常棣之华、异性姊妹，一生荣辱上下，和乐且湛。他们的学问渊博专精，在与惠栋、沈彤、戴震等大家的切磋过程中，以嘉定朴学派胤嗣的身份（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自别于惠栋和戴震。尤其是钱大昕，于经史子集、音韵训诂、典章制度、氏族地理、金石文字、天文历法，无不精研考证，剖析源流。梁玉绳把他比作郑玄，王昶把他比作王应麟，钱载把他比作顾炎武，江藩《汉学师承记》赞曰“先生学究天人，博综群籍，自开国以来，蔚然一代儒宗也”。

钱友情同手足，性情却大不相同。王鸣盛颇有盛唐诗人豪迈之风，其锋芒毕露，不畏俗言的处世方式常遭人诟病，他的自负、好财货，又给不喜他性格的人留下诸多口实。陈垣说他“好骂人”“又乏修养，自以为是”（《书十七史商榷第一条后》）。钱大昕则平和谦抑，擅长识才，奖拔弘举，甘为人梯。最为学界乐道的两则佳话，一是他“发现”了戴震的经学才华，将戴震举至京、困于逆旅的戴氏推荐至学术核心圈，使海内皆知有戴先生；二是“看见”了邵晋涵的史学天赋。他于二人都是知之最先的伯乐，推崇备至，其胸襟气度，堪称典范。虽然戴震在世时以世之第一人自居，钱大昕也甘愿居后、潜德善下，但戴死后，钱所得赞誉与评价实际上已超越戴氏，其史学贡献更非他人可及，陈寅恪先生誉之为“清代史学家第一人”。

平心而论，王鸣盛虽给人以自傲之感，但若换一种角度来看，未尝不是真性情的流露。他在《咏怀》中云：“中宵拔剑起，忧怀浩漫漫。丈夫自有志，穷贱莫足患。”正是李白“拔剑四顾心茫然”似的壮志难酬，乃急于建功立业的

奋发心态。那么，同处昂扬时代的钱大昕是怎样的状态呢？恐怕年轻时的钱氏，入世的欲望要更迫切些。柴德赓先生分析青年钱大昕献赋行在的心理道：“王、钱两家虽然都住在嘉定乡间，王家境较好，钱家较贫，竹汀的祖和父都是以秀才在乡下坐馆。钱王联姻，主要是由于竹汀十五岁中秀才，被王西庄的父亲赏识，到王家去入赘的。这种赘婿生涯，在那个时代是被人看不起的……竹汀想以功名自奋，是可以理解的。”（《王西庄与钱竹汀》）钱氏虽在十六岁订婚后受岳父王尔达和内兄王鸣盛指授学问，但早慧甚晚，二十岁始正式入学。他早慧，少时即被视为“远大之器”（《竹汀居士年谱》），但家庭寒素，骨相寒陋，“人嘲碧鹤”（《祭外舅虚学先生文》），且善病，面对王尔达“素奇”的幼女，内心依然充满了“安许”的惭愧。即便女人和内兄始终以为他为“快女婿”，仍免不了王家诸亲戚和仆们各种各样的“窃议”。试想，生活在寄人篱下的氛围和环境中，钱大昕内心渴望功名成就的火焰一定是熊熊燃烧的，何况，他十八岁时就有“尚论千古之志”了。

## 幸

而，妻子王顺嫔温婉明慧、善解人意，不以科第为轻重，为他营造了安定从容的研学环境。王氏的接纳、欣赏和爱护，无疑加持了钱大昕的自信。

婚后第二年即乾隆十六年皇帝首次南巡，他因献赋试而被特赐举人，授内閣中书，由此开始了一帆风顺的仕途。低开高走的赘婿生涯，是他成为四品京官和汲古大家的第一枢纽站，被王家视为掌上明珠的爱女，则是调柔平衡他焦虑和冒进情绪的摆渡者。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序》称钱大昕“理明”“气和”，评他的著作“淳古澹泊”“条罢而无好尽之失，法古而无摹仿之痕，辩论而无叫嚣攘袂之习”。不激不随、温厚体恤的性情与修养完全内化于著述风格中。钱大昕评价戴震学术品格的话也适合他自身，“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亦不过誇其辨以排击前贤”（《戴先生震传》），既坚持己见又不自矜其能，宽容体谅，有仁者风范。然而他在《祭亡妻王恭人文》中说自己曾“颀而固”“躁多悔”，可知他初年并不平和，然最终能“因拙得安，亦任亦隐”，成为“天之幸民”（《自题像赞》），实得力于妻子的教偏复中。王顺嫔与他生活十七年，伉俪情深，“离别之日殊少”（《亡妻王恭人行述》），她以“知足为‘知道’，少欲多施，布衣蔬食，处之泊如；她是‘静多功’的贤妻，亦是‘慧且通’的诤友，‘耽思致疾，子恒戒我。放言召诤，子强谏我’（《祭亡妻王恭人文》）。久久为功，钱氏长期耳濡目染妻子守常葆真的淡然态度，处世方式自会

变化，性情亦随之重塑。他一生种德善素、因文见道，温馨和睦的家庭生活乃其尊德性和道问学的基础，王顺嫔对其谦逊祥和气质的养成，功莫大焉。他在给妻弟王鸣韶《祖德述闻》作序时，回忆道：“住子学为古文，予妻在旁，见子得意辄喜。自先妻之亡，予忽忽不乐，古文久辍，为，伸纸序此，不自知涕之横集也。”琴瑟和鸣，莫不静好，此情此景令人联想到归有光《世美堂后记》中芍药花开，妻子具酒问劳，相知相守的动人画面。

其他家庭成员对钱大昕品行与学术的影响亦如益入水、如露润木，启蒙教导，皆溢以正法。祖父钱王炯于四部书靡不研究，教学有法，认为读书必先识字，“四声清浊，辨别精审”，“士大夫有难字疑义，从府君取决，皆得其意以去”（《先大父赠奉政大夫府君家传》）。钱王炯享年九十二，其长寿与不妄求的心态有关。他年六十九时，恩诏赐七十以上长者粟帛，乡人多增年以邀上赐，他却正色曰：“人可欺，天可欺乎！欺天而罔上，吾不为也。”钱大昕儿时听闻此语，心灵受撼，终身不忘。钱王炯以《管子》语教子弟曰：“釜鼓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又举《淮南子》语“唯不求利者为无害，唯不求福者为无祸。”（《记先大父逸事》）这些不欺世欺名、淡于名闻利养的言论，在少年钱大

## 论衡

## 蔚

然一代宗师的长成，亦离不开岳王大家亦师亦友的支持与砥砺。王尔达不但爱誉儿子，还爱夸女婿，始终期许甚厚，有人嘲笑他的夸誉，则曰

“久当信我言”（《虚亭先生墓志铭》）。王尔达古学根柢深厚，鉴识卓然不凡，钱大昕受其熏染十年，学究天人的古学根基由此铸牢。同时，才气浩瀚的妻兄与他奇文共赏、疑义质难，“傲厉”无虚日，“缓颊”的钱氏方渐得“树立”（《西泠先生墓志铭》）。学界对王钱的学术高度一直轩轻分明，贬前而褒后，但这有因两人个性不同而导致的评价不允的成分。王鸣盛对钱大昕、曹仁虎（钱氏远亲）教护有加，发蒙起覆，功不在小；他考史批漏多，则需宽容对待，毕竟草创者疏，理者转密，他以治经之法治史，求是求真的前导作用还是亟需肯定的。若以英雄比之，王鸣盛像曹操，钱大昕是刘备，曹仁虎为孙权，三人鼎足而立，是乾嘉时期嘉定的奎星三杰。

相比于独学无友、自学成才的青年戴震，钱大昕幸运太多。他有绩学通达的原生家庭，志同道合的岳家，博学多闻的两门师友营造出切磋琢磨、相得益彰的学术环境，为他潜研覃思、修身养性提供了绝佳港湾。同时，与王鸣盛、曹仁虎的旷世情谊是他“生平第一快事”（《习庵先生诗集序》），钱氏以为李杜、元白、韩孟、皮陆等往世齐名者“俱非同在一乡，不如他们三人‘望衡对宇’‘亲炙其性情学问’快慰平生。可以说，钱大昕的学术血脉来自嘉定本土，后来与惠栋、沈彤、王昶、纪昀、朱筠、戴震等大家的交游虽有师友之谊，但属于成年后额外的精神营养与学术补给，那时他羽翼渐丰满，其他师友提供了新的飞翔高度而已。钱大昕治史注重舆地及风俗移易，以其理论探究他谦谨君子品性与朴学笃行素养的养成，便会发现有趣的自治，他的古学造诣与嘉定地域文化和家庭的滋养陶铸密切相关。

（作者单位：上海科学技术职业学院）